



绪 章

西周（1829—1897）被学术界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他作为“哲学”一词的译者，可称为日本西学东渐史上的第一人。第一个正式将西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就是西周，他是“西方哲学最早的移植者和开拓者”，^①经西周之手译出的像“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演绎”“归纳”等译词已经成为人们在表述哲学概念时所不可或缺的依据，直到现在仍被人们广泛沿用。很难想象东方哲学史上如果没有西周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表达这些哲学范畴。正如中山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哲学用语大部分都是西周等人在明治初所翻译创作的”。^②

① 朱谦之. 日本哲学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 中山茂. 日本人の科学観 [M]. 大阪：创元社，1977.



第一节 西周其人

西周于文政 12 年（1829 年）生于日本石见国津和野（今日本岛根县鹿足郡）森村堀内的一个藩医的家庭。其祖上原是远江国（今静冈县）相良之名门望族，因世代行医，曾辗转迁徙于肥后国（今熊本县）佐敷、肥前国长崎（今长崎县）、京都、大阪等地。太祖时习擅长“疡医之科”（外科），受石见国藩主龟井兹亲之聘，从大阪迁居鹿足郡津和野，从此作为藩医世代延续下来。西周幼名经太郎，后改鱼人。作为藩医世家的长男，为继祖业，依照当时的风俗习惯，10 岁起不再蓄发，号为“寿专”。嘉永元年，西周 20 岁之时，接到藩主“一代还俗，修习儒学”的命令，蓄发改号为“修亮”。由于江户幕府末期德川家的公文中将其名字写作“西周助”，则一直采用此名。明治时代，由于其名中的“助”字与当时朝廷的官名用字相忌讳，受朝廷之命，将“助”字略去，改名为西周。

西周自幼勤奋好学，这得益于其祖父的影响。西周祖父时雍原是津和野内科医生井关藩利的四子，后作为西周曾祖父时荣的养子进入西家，精通内外两科，曾是山口刚斋（山崎暗斋门派）的高足，对儒学颇有研究。西周幼时由祖父亲自授书教字，4 岁读《孝经》，6 岁读《四书》，开始接受祖父对尧、舜、禹、孔孟思想的讲解与启蒙。祖父去世后，西周 12 岁时进入藩学养老馆，师从山口慎斋、森秀庵、村田要藏、小野寺藤太郎、瓜生重藏等



人,读《五经》《近思录》《靖献遗言》《蒙求》《文选》《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家之书。

关于其勤奋好学,一度曾经流传有“西周买油、粉碎春米”的佳话。说的是少年时代的西周在买油的路上——一手提油瓶,一手拿书苦读的情景,其读书痴迷到甚至将鞋子左右穿反亦不自知的程度;关于西周春米的佳话,说的是在春米的过程中,由于西周专注于读书,而忘记及时关掉春米机,而使得原已舂好的大米被打得粉碎。更有甚者,由于珍惜读书时间,西周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不回饭厅与大家共同进餐,而是将饭团带入书斋,边吃边读。由于西周对读书过于痴迷而忘记工作,当时的邻居们曾在街头巷尾议论说“西家真可怜,生了个傻儿子”。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周在幼少年时代对读书的痴迷程度。可以说正是对知识如此的痴迷才造就了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

西周在青年时代曾受幕府命令于文久2年(1862年)前往荷兰进行了为时三年的留学生活。在莱顿大学师从当时的法学博士维塞林,学习“五科之学”。回国后历任开成所教授、兵部省高官、陆军大丞、参谋局课长等政府中的重要职位。作为社会活动,西周参加明六社的集会,积极投稿并发表演说。明治3年时,西周开设家塾——育英塾,讲授“百学连环”等哲学课程,普及西方哲学知识。

西周重要的哲学论著与译著有《万国公法》《百一新论》《致知启蒙》《心理学》《利学》《权利争斗论》《百学连环》以及《性



法说约》等。其中尤以作为“哲学”一词最早翻译的论著——《百一新论》最为著名。

第二节 西周的哲学译名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

从上述人生经历可以总结如下，西周的学术生涯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学习儒学时期，从1岁到26岁的时期，具体时间是1829—1854年。这个时期是西周学习中国传统哲学的时期，是其读书甚为痴迷的时期，亦是其打下学术与思想基础的时期。这个时期西周大量阅读并吸收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营养，所读书目均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经典书籍，涉猎广泛深入。西周主要阅读书目有《孝经》《四书五经》《近思录》《靖献遗言》《蒙求》《文选》《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先秦诸家之书，“涵泳于经史百家者，亦复有年矣”，^①可以说从幼时起西周就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儒学训练。这个时期的著述有《岁晚书怀》《记事论文》《养材私言稿本》《覆酱集》《杞忧广议自叙草稿》以及《家谱略履历旧记》等文章。

第二个时期，研习洋学时期，从26岁到37岁的时期，具体时间是1854—1865年之间。这个时期是西周开始转向西方哲学的

^① 引自西周所著《对徂徕学之志向述怀一文》，见大久保利谦：《西周全集（第1卷）》[M]。东京：宗高书房，1960。



时期。西周于 1862 年至 1865 年赴荷兰留学,在赴荷兰留学之前,西周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西方。西周从 1854 年开始学习荷兰语,进而学习英语,为去西方留学打下基础。这个时期的著述有《丁巳十月草稿》《向藩主建言》《承美私言》《津田真道稿本〈性理论〉之跋文》以及在荷兰期间写作的《西洋哲学史之讲案断片》、西式笔记本 2 册等文章资料。

第三个时期,翻译创作时期,从 37 岁到 49 岁,具体时间是 1865—1877 年之间。这个时期西周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哲学以及法学原著,在译介西方哲学概念之时西周创造了大量译名,诸如“哲学”“理性”“感性”“悟性”“主观”“客观”“抽象”“演绎”“归纳”,这些译名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一直沿用至今。这个时期的译著与著述有《泰西官制说略》《议题草案》《百一新论》《万国公法》《德川家兵学校定书》《学原稿本》《语言的基础》《百学连环讲义》《生性发蕴》《百一新论》《致知启蒙》《心理学》《教门论》《知说》《人生三宝说》《美妙学说》《利学》等。

如上所述,西周学术生涯的第一个时期——研习儒学的时期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其学术与思想形成的基础时期。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儒学对西周的影响非常深刻。正是如此深厚的汉学功底使得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有着非常准确深入的理解,从而在其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能够将西方的哲学概念与东方原有的思想文化融会贯通,将其准确而巧妙地对译出来。



对于西周来说，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始终是其在翻译介绍西方哲学时作为对比或参照的前提和依据。例如，在《开题门》的开头部分写道，“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在这里，西周提出西方哲学与东方儒学讲的是一个道理，其实是一回事。而在《开题门》的附录中针对“为学”的方法，西周则有如下论述，“然而学之立必归功于四元，何谓四元，显而有形谓之物，物有天则示象于吾人之灵慧谓之理，理之寄于人心，依喉舌之机而发之谓之言，言之闭局矣，于是取资乎，手指之运用与楮毛之用以通古今，一段一通，谓之文，四元之立学可得而语矣”。所为四元指的是“物”“理”“言”“文”，从“物”到“理”，进而从“言”到“文”。可以说该四元学说正是西周灵活应用东方传统思想中的“格物致知”对西方哲学产生过程的总结。

纵观西周所翻译、创造的哲学语词，可以发现在西周的译词中能够找到许多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固有的概念与范畴。他在译介西方哲学概念范畴时，始终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中的基本概念作为其译名的载体。比如，贯穿西周译介的哲学词汇中就有“性”“理”“观”“觉”“识”“象”“天”等语词。关于“性”的译名就有“理性”“悟性”“感性”“属性”“植性”“动性”“记性”“悟性”等译词；而关于“理”的译名则有“性理”“物理”“元理”“心理”“实理”等；与“观”有关的译名就有“主观”“客观”“宇观”“宙观”“处观”“时观”“质观”“性观”等译



词；与“觉”有关的译名则有“感觉”“知觉”“触觉”“外觉”“内觉”等；与“识”有关的译名有“意识”“学识”等译词；与“象”有关的译名有“现象”“印象”“抽象”等；与“天”有关的译名则有“先天”“后天”等词汇。

西周所译介的上述哲学译名为何能够如此顺畅地被人们所接受并且沿用呢？关于这一点，手岛邦夫认为：“西周所翻译的哲学词汇之中有一半左右一直被沿用到现在，而与西周同时代的学者相比，西周的哲学译词流传率最高，现存率也最高。其理由是，比起其他学者来，西周的哲学译词更加贴切，更加具有近代性。”^①手岛氏的见解有其道理，但是笔者认为，西周的哲学译词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另外一个深刻原因，那就是——经西周之手所翻译过来的哲学词汇中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儒学）范畴，其中很多概念就是儒学概念的重新排列组合。这对于生活在东方思想文化的话语中的人们来说，可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和力。这大概就是西周的译词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西周所译介的这些哲学词汇，究竟和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有着何种联系？又有何种区别与不同呢？西周在译介这些词汇的时候，究竟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中继承了什么、借鉴了什么，进而又超越了什么呢？可以说，明确这些对于从新的角度加深对西周哲学思想的理解有着巨大的意义。

① 手岛邦夫，西周と『明六雑誌』の訳語 [J]. 仙台：国語学研究，2000：39.



第三节 学界的研究与本书的主要内容

目前中日学术界对于西周的研究主要分哲学思想、翻译理念以及哲学词汇创译等三方面的研究。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主要有莲沼启介《西周に於ける哲学の成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法哲学のためのエチュード》（有斐閣，1987年）、有坂道隆《日本洋学思想史研究》（創元社，1987年）、小泉仰《西周と欧米思想との出会い》（三嶺書房，1989年）、崔新京〈论西周的哲学思想〉（《日本问题》（1），1988年）、井上厚史〈西周と儒教思想——理の解釈をめぐって〉（島根県立大学西周研究会編，《西周と日本の近代》，東京ペリカン社，2005年）等；在翻译理念方面的研究有刘秀芬〈中日近代哲学家严复西周同异论析〉（《理论学刊》（6），1990年）、王克非〈汉字与日本近代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4），1991年）、手島邦夫〈西周与『明六杂志』的译词〉（《国语学研究》第39集，2000年）、手島邦夫〈西周の訳語の定着——『哲学字彙』から明治中期の英和辞書と中後期の国語辞書へ〉（《文艺研究》第154集，2002年）、刘小珊等〈日本明治启蒙思想家西周的语言文字观考述〉（《东南亚研究》，2010年）等；关于哲学词汇创译方面的研究有徐水生〈西周在西方哲学范畴汉字化上的贡献〉（《延边大学学报》（4），2007年）、卞崇道〈东亚哲学史上西周思想的意义——透视“哲学”用语的定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6），2007年）、藤田正胜



〈日本如何接受哲学〉(《日本问题研究》(1), 2012年)、狭间直树〈西周留学荷兰与西方近代学术之移植篇〉(《中山大学学报》(2), 2012年)等。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 中日学术界除了针对西周哲学思想或西周哲学译词的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之外, 还有关于西周哲学词汇创译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值得借鉴。然而, 迄今为止的研究对于西周译名的哲学意义及其译词的思想传承方面却少有涉及。

西周在译介西方哲学概念范畴时采取从中国古典中提取关键词的方法, 而其所提取的关键词则是中国传统哲学(儒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 其中最常用的就是“性”和“理”。例如, 西周所创译的使用“性”的译词与新造词有“感性”“悟性”“记性”“性质”; 而其所创译的使用“理”的译词则有“理性”“心理”等哲学常用词汇。“性”与“理”是中国传统哲学(儒学)中的重要概念范畴, 是中国儒家在表达对于人与自然宇宙等方面的理解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范畴。那么, 西周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西方哲学中的何种概念对译为中国儒学的传统概念“性”与“理”的呢? 这与他对中国儒学传统概念“性”“理”的理解有什么联系呢? 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将这些关键词配以其他词汇从而创造出不同的哲学概念的呢? 他创译出来的这些哲学概念又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引进并继承下来的呢? 本课题试图通过解决这一问题, 可望能够揭开中国传统哲学对于日本近代哲学在概念传承上的影响与作用。



本书以西周的著述、论文、书信、讲义、日记、笔记等第一手资料和史料为依托,通过关键词的查找,提炼出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著述、不同语境中所对译出来的不同哲学译词,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比对分析,从而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在西周的著述中提炼出与“哲学”相关的问题点,重新考察“哲学”一词的翻译过程以及西周之所以将“philosophy”对译为“哲学”的原因;另一方面,挑选出“性”与“理”这两大西周哲学译名中既与中国传统哲学密切相关又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通过对西周在翻译过程中对该词的翻译处理方法的分析,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原有哲学范畴的比较,明确西周在东西思想相互冲撞中所进行的对于传统思想的继承、借鉴与发展,及其对西方哲学思想的接受过程在翻译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达到对西周的哲学思想更加深入地把握与理解之目的。具体来讲,在对“性”这一哲学概念的研究方面,通过对西周所对译的“性”这一概念的不同译名的考察,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概念的异同,探求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性”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发挥;在对“理”这一概念的研究方面,通过考察西周所翻译的“理”这一哲学概念的英文译名,及其与中国传统概念中的“理”的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明确西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的理解,从而进一步考察中国传统哲学对西周在哲学译名上的影响与作用。

第一章,绪章部分,在介绍本书背景知识,包括西周生平、